

南方学院
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学术单刊第九种

**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
困境与反思**

—— 郑良树教授访谈录

叶金辉

马来西亚
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ress
Southern College
Malaysia

- 欢迎学术界惠稿，作者将获赠三十册。
- 书内各篇乃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社、南院的立场。

本书出版印刷费由李氏基金资助，谨致谢忱。

承印商：OREN PRINTING SDN. BHD.
34, Jalan Penaga 10
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
81750 Masai
Johor, Malaysia

学术单刊：

第一种：〈南大精神与民族教育〉座谈会（李元瑾•李业霖•陈松沾）

第二种：〈日本战前的南洋移民〉（郑良树）

第三种：学术文化讲稿两篇（郑良树）

1. 〈春秋〉万言，只在一字褒贬

2. 打造文化，带领历史

第四种：〈抗日事迹讲演会〉

第五种：〈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图书馆现况调查报告与探讨〉（何蔚芳）

第六种：〈藤坡与新山——柔佛州双城记〉（郑良树）

第七种：〈癸未甲申的大马华教——以郑良树为切入视角〉（毛策）

第八种：〈“华语”一词的历史演变与发展〉（庄妙菁）

国学、汉学与中文系的 困境与反思

—— 郑良树教授访谈录

访问与整理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助理秘书叶金辉

简介

郑良树教授，字苜牟，祖籍广东潮安，194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1960年赴台留学，后获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乃获此学位之首位海外华裔。曾任马来西亚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研究院、伦敦大学与香港大学访问学人、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新马区指导教授与国立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研究所教授，2003年荣休返马，现任大马柔佛州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暨讲座教授。

郑教授先后担任多个团体顾问，诸如大马国立玛拉工艺学院学术顾问、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会长及顾问、河南老子学会名誉顾问、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顾问、北京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问、天津孙子兵法研究会高级顾问、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学术咨询顾问、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筹委会特约顾问等。

除此，他也是广州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海外华侨华人研究论丛》特约编委、马来亚大学东亚系校外考委、中文大学人文所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秘书、《海外华人研究通讯》主编、香港中华文化资料中心筹委会委员、人民大学孔子学院学术委员、北京外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编委等。

郑教授著作等身，多年来的国学专著有《淮南子通论》、《淮南子校理》、《战国策研究》、《孙子校补》、《春秋史考辨》、《竹简帛书论文集》、《老子论集》、《续伪书通考》、《古籍辨伪学》、《商鞅及其学派》、《韩非之著述及思想》、《韩非知见书日》、《老子新校》、《辞赋论集》、《商鞅评传》、《诸子著作年代考》等。新马华人研究方面出版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从》、《新马华族史料文献汇目》、《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册)、《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柔佛州潮人拓殖与发展史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新马华校个案研究之一——宽柔纪事本末》、《林连玉评传》等，并编有《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与《林连玉先生言论集》。其中有些学术著作未经许可被两岸盗印出版。

郑教授可谓左手著述，右手创作，共出版了14部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游记与历史小说)与3本书画集。计有《说因缘》、《中央之国》、《回荡在大马校园的师生曲》、《香港大学》、《爱山的民族》、《石叻风云》、《青云传奇》、《我情我怀》、《让香港人继续做梦》、《青云与石叻》、《柔佛的新曙光》、《吉隆坡的诞生》、《百年书画集》、《百年书画二、三选》等(著作年表详见附录)。自1987

年迄今，郑教授与夫人李石华女士共举行过4次书画展，并有多部书画作品珍藏于海内外多所书院、大学图书馆、文教机构、研究中心等地。

郑教授毕生孜孜于主治中国传统国学（文史哲校勘、考证与辨伪），兼及大马华文教育史、华族史料、方言群、德教、华团、家谱研究等，也擅于中国书画，创作小说散文，乃名副其实沉潜于中华文化海洋中的全才型学者，也是马来西亚饮誉国际汉学界的第一人，并标帜着新马汉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大陆学者毛策著有《郑良树评传》（大将，2002）与《郑良树研究》（北京图书馆，02）。

郑（代表郑教授）

叶（代表叶金辉）

访谈日期：2005年7月19日下午一时半

地点：南方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

郑：我看了这份问卷以后觉得很感动，因为体现出提问者对华社与华人问题的关怀，很能代表南洋大学校友的专业水平，是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一种承担，所以我希望这一份心意，如果日后整理成访谈录能够尽量转载开去，让大家共同思考。

1. 个人治学历程与风格

叶：您完成柔佛潮州研究后，紧接着现在又着手进行柔佛客家研究。为何在众多本土华人研究领域中

选择方言群研究？方言群研究在华人史研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与影响？

郑：我并不只是从事方言群研究，还有华教等其他问题，方言群研究只是我的部分研究而已。我们的祖先最初南来时是根据各自的方言群类聚，所以早期华社是由很多的方言群所组成，许多社会文化制度的运作特点与由来都可从方言群的角度得到解答，至今似乎仍摆脱不了这样的格局。如果我们从方言群的角度研析华人社会，会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推动潮州学研究的目的。

叶：可是随着历史时代的演变与时人的青黄不接，这种方言群的凝聚与影响会逐渐减弱。

郑：这是无可避免的，一定会慢慢减弱，不过它潜在的影响力还在。譬如今天新山表面上已经不再是潮州人的社会了，可是潮州文化还在背后起着一定的影响与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新山有宽柔五间华文小学，学生超过一万名；宽柔有两间中学（校本部与分校），学生总计接近八千人。南方学院是宽柔衍生出去的，原名取“宽柔学院”，批准时改“南方学院”。“宽柔”已不再是个校名，而是个学村，有如当年陈嘉庚在厦门与集美创办的“集美学村”一样。宽柔学村各校的董事不但是互通，宽柔五间小学还共一个董事部！这就是新山人所经常强调的“古庙精神”！五帮与五大方言群共

和的精神。而五帮共和的精神就来自“潮州义兴”！举此例，就可以知道研究今日华社的各项课题，方言群怎么可以忽略？

叶：中国传统治学特色是文史哲不分家，能否以您的治学经验与心得进一步解说分家与不分家在研究上各别具备的意义与优缺点？

郑：这很难详细说明，分家与不分家各有优点，问题在于优点与缺点的多少比例。以一些比较传统的大学来说，中文系的学生可以修读哲学系的课，哲学系的学生也如此。哲学系《庄子》这门课重点在讲庄子的思想，中文系的《庄子》却从文字训诂讲起，使你先读通这本书，这是哲学系老师难以做到的。学生可以两边同时修学，表面上是文、史、哲分家，实际上还是打通的。如果我们坚持分家，哲学系的学生文字训诂都还没讲通，就大谈庄子思想，恐怕就会出现许多疵漏；相反地，中文系学生只停留在文字训诂，却又无法得到庄子的精华。所以，表面上说文、史、哲应分家，实际上骨子里头应该合的。有一部《庄子今注今译》，在庄子思想方面诠释得不错，但是，在文字解说方面就出现许多问题了，原因是作者不是中文系出身的；这正好说明分家的缺点了。

叶：能否这么说，要专治中国国学最好文史哲兼通？

郑：最好从文字训诂方面着手，当然一个人的精力也

是有限，只是学习文字训诂方面就花去不少时间，哪里还有时间去搞自己的哲学专业？两者兼通是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应由两个学系合作，比如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把文史哲的学科都收览进去，也许是一个好的办法。

叶： 那么哲学研究所呢？譬如我研究熊十力与儒学，该去哲学研究所还是中国文化研究所？取决于从那个角度为研究视域吗？

郑： 所有和中国有关的学问的科系，都可以收纳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里，当然胥视个人的才能而定。

叶： 由于中文系背负着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的功能（相信任何国家或区域的民族语言或文化科系必也如此），所以往往被大马视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旗舰科系，这是资源的限制抑或边缘化政策下华社的民族自救与条件反射。然而，此种透过学统发扬道统所衍生的问题是：大家竞相设立中文系，却忽略了历史系、哲学系（除了作为官方宗教的回教研究系不论，大马只有2所国立大学开设历史系与一所大学开设回教哲学系）与其他人文科系？以致出现失衡的现象。由于集继承与发扬民族文史哲与语文于一身，念中文系的本地学子，除了致力于反刍传统中国深厚的国学精髓作为民族母体文化的奠基与源头活水之外，多重的身份与认同下，亦肩负着关怀与开拓本地各领域（华人或族群研究）的义务与

使命，以致瞻前顾后，疲于分心，最后顾此失彼，焦点分散，如学百艺者，博而不精，于是学术生命变得乏善可陈。您曾为文疾呼关注传统华文的精致性，表示了您的忧思，指出无法想像“中文系的学生没有念过《离骚》、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当然，可幸的是，作为传统国学与本土研究的佼佼者，您的硕果累累与非凡成就，标志着游刃两者兼之的成功典范与异数。能否分享您在鱼与熊掌、左右逢源且得心应手的心路历程？

郑：其实我也兼顾得好辛苦，不过，已经习惯了。除了国学之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四大册花了我七、八年的时间。（**叶：**您如何在香港搜集这些本地剪报资料？由教总提供吗？）我在马大教书那十多年里，已经搜集了许多资料；在中文大学教书时，曾抽空回来大马，到教总看资料，全部影印再带去香港，花了很多精力，幸好中大的宿舍面积很大，可以安置这些资料。资料的阅读、筛选与编排等整个过程全由我自己一个人动手去做，非常吃力。

叶：这正是您令我们感到钦佩的地方，您如何做到七、八年后可以出版四大册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的同时，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可以数年内诞生一部“大块头”著作？

郑：我的生活很有规律，在香港时，我早上除了教课

之外就是研究汉学，下午搞华教史，晚上画画练字，每天严守三段分法，坚持下去，甚少到外应酬。所以我的书房有三张桌子，一个是作为国学研究之用，一个用作研究华教史，一个用来作画习字。现在没有了，我的房间只有两张桌子，分别用来研究国学与书写画画，而本土研究则在这里（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进行。至今我还是坚守这种时间分段，所以我在这里搞本土研究，同时也撰写了四、五篇有关汉学的论文寄到国外去发表。

叶：中文系的主调是文学，可是兼具史、哲、语言等属性学问，因此永远比历史系、语言系、哲学系有更广博无涯的领域（粗略而言，比如文学可以断代、文类、文论、流派等，分上古、中古、近古、现当代等；而历史至少就有廿四个庞大的朝代体系、另有史论、考古、典制研究等。思想领域，除了开人文之始的先秦，还有理学、心学、佛家、现代西学东渐等。小学方面，包括了文类格律、训诂、音韵等。以上所述仍未包括研究方法，尚有牒谱、民俗、校讎、辨伪、经学、敦煌学、金石学等研究），浩如烟海，多不胜数。由于国情与身份的迥异，本地中文系无法全然类同于大陆两岸三地的中文系。您曾说人生读书求学问分三大境界，立定五年学习目标，第一、第二年投入大量精神、第三年上手后，第四年就是半个专家了。才能从年轻时代的“门缝窥月”，进入中年时期的“庭院赏月”，以致学有所成后的“台上玩月”

（见《今日南院》第九期，2002年6月）能否以此为例，举一二具体治学例子，给中文系学子指点迷津？

郑：我记得常跟学生说治学先从一个点开始，点至点连成线，就是半个专家了，由线组成面，已经是个专家，从面构成体就是大师了。所以，尽管中国的学问繁富复杂，但是不要迷失，还是从点做起。

叶：可以具体举例吗？

郑：好像你研究先秦诸子，先选攻荀子，深入研究以后再钻研孟子，把儒家的脉络厘清，再研析孔子与《论语》，儒学贯通成线以后，再开第二条线，如法家韩非子、商鞅、管子、申不害等，打通这条线以后再辟第三条线，依此类推，我相信每条线只要花上五年，早晚会成为这些领域的专家了。这是我的经验与方法。

叶：您于70年代在大马率先举办首次学术研讨会；时至卅年后的今天，华社对学术研究仍然不堪重视，以致创办近20年的华社研究中心仍惨淡经营，残喘苟生，您认为原因何在？如何塑造并提高华社的学术研究风气？

郑：如何整合华社的资源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没获得解决以前，要塑造并提高华社的学术研究风气是不可能的，华社研究中心的难题也一

样相应地永远存在，很难解决。华社的大企业家缺乏投资学术的观念，不像香港的企业家。美国哈佛大学不正是哈佛氏过世以后捐出遗产资助大学而命名吗？这是整个华社文化的问题。

叶：为何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香港具有这种文化？

郑：因为他们受英国的影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的文化毕竟比较高，人种也比较单纯。

叶：你曾对学生说：“到国外留学，越远越好。拿不到博士不要回来，拿到博士一定要回来。”能否解开这句话背后的意涵？

郑：意思是鼓励学生下定决心远赴重洋去念书，不要受到儿女情长的影响，男儿志在四方，为学问而学问。

叶：可是结果很多华人取得成就后在外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不愿回来。还有，许多人会认为如今是地球村时代，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遂有楚材晋用、“士为知己者死”的社会现象。当国家与个人、国族与民族、现实与理想产生冲突时，以您的人生历程为例，您会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

郑：我很难告诉你怎样去取得平衡，只能说依照个人的情况去思考去决定。一个理科人才回马，假如

连设备齐全或器材先进的实验室也没有，则无异于学术上的自杀，与其如此，不如还是留在外国发挥个人专长吧。

叶： 如果他立志回来奉献社会？

郑： 这当然是伟大的精神，可是已经无法再提升自己了，殊为可惜。当然，像钱学森那样伟大的人物也是有的；不过，那必须要有一种崇高的目标或精神在呼召着，才会有这种人物的出现。我们可爱的马来西亚有吗？

叶： 所以这里面存有一种两难。留在外国自我成就也不能一概说是“小我”，像杨振宁等人，如果不是留在美国就无法攀登学术高峰甚而获得诺贝尔奖，而且一直心系中国，愿意在晚年回馈与献身祖国，到清华大学去培育人才。

郑： 是，这问题很难一刀两截去说明。日前马来西亚最缺乏的便是全民认同的崇高目标和全民认可的伟大精神，所以，知识分子营营役役，无法创造伟大的历史。当然，英雄也可以创造时代，历史老人也许还在期盼着。

叶： 可是有些人留在外国为的是贪图安逸与享受物质。

郑： 那也是一种生活选择，不能怪他。我们的国家提供

了什么方便给他们呢？

叶： 不过我们移民社会不像西方国家，他遗忘了当初他利用华社许多资源才能如愿地学有所成……

郑： 那当然就不应该了。总之，这是一个遗憾。

2. 中文系的属性、汉学与国学的义界

叶： 您成才于台湾，在香港学界大放异彩，在大陆享有盛名，试比较大陆两岸三地大学中文系的特色与发展走向。

郑： 其实中、港、台、新、马开办的中文系存有相当大的差别，我甚至曾经尝试收集一些材料做比较研究，提出自己个人的看法，因为各地中文系的差异对将来中文系的影响很深。台湾的中文系至今仍保留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主调的传统国学型，在中文系里可念到《史记》、《左传》，历史系学生要修《史记》就到中文系来，哲学系学生要听《庄子》也到中文系来，虽然哲学系也开设《庄子》，但是属于庄子哲学，而非专修《庄子》原典。而大陆的情况，我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中文系的课已经被其他科系挖空了，只剩下文学与语言两种。”虽说文学的课开设得很精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等等很多课程，可是基本上就仅限于这两个范围，因为经、史、子部已经被挖空了，所以情况有些可怜，似乎没有什么课程可以开设了。其实大陆大学还有古籍研究所，也

开设一些选修课程，可是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这些精专而且研究古籍必备的学问与课程，反而没有人开设，对古籍研究来说，将来会构成一些难题。香港方面，以中文大学为例，当然也受了大陆的一点影响，语言学的课程较多，但早期都有开设《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经书如《左传》、《诗经》等，一些课连台湾也没有，所以课程相当周全。虽受大陆的影响，但中大同时也沿袭了自己的传统特色，属于另一种格局。至于新马，则更加特别了，大马的中文系加入了很多马华史、马华社会、马华宗教等课程，从本土化来看似乎无可厚非；其实强调本土化是受了台湾的影响，被牵着走。本土化有正面的价值，但如果多到侵占了中文系的主体课程的话，则中文系就开始变质了。我曾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建议，说干脆将这些课程独立成为“马华文学系”或“大马华人学系”，更加名正言顺，而且可以开办得更精细，问题在于马华文化是否具备足够的资源成为一个学术范畴。中文系有五千年的历史积淀，而“马华文学系”等恐怕在这方面资源不足，以致现在形似“半独立”于中文系的课程结构内。新加坡也是如此，甚至走得更远。例如，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就相当特别，有文学课程，也有“东南亚华人”、“新加坡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中国在亚洲”、“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中国与亚细安”、“全球化的中国”、“理解中国”、“晚明文化中的情与欲”、“华文剧场与表演”等……可

能我的观念太陈旧落伍了，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种中文系。山此可见，中文系过分歧化，迟早会失去方向。

叶：其实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成立以前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系比较倾向于语言课程。刚才您谈到台湾本土化的问题，早几年前由于台独意识高涨，绿营在“去中国化”的思想下要求台大开办“台湾文学系”，台大中文系的柯庆明教授也撰文回应。此事后来如何呢？

郑：没开办成。这胥视台独的势力如何，要是一天独立成功的话，这看来是势在必行的事了。不过，我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极力反对台独。

叶：从1925年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亚洲中华文化区的中文系、台湾师大的国文系到海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中华语言与文化系，可见中文研究从倾向古典的国学到包含现代中文研究的“中文系”之广义发展沿革。您曾撰文〈读中文系的人〉（见《回荡在马来校园的师生曲》）指出，所谓“中文系”理应理解为“中国文化系”。您认为传统与现今中文系课程的主干结构应该为何？如何看待台湾师大国文系、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与文化系的倾向与性质？

郑：我认为应以传统中文系课程为主干，也就是你提